



孔子家语通解

杨朝明 宋立林 主编

齊魯書社



孔子家语通解

杨朝明 宋立林 主编

齊魯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孔子家语通解 / 杨朝明, 宋立林主编. — 济南:
齐鲁书社, 2013. 11
ISBN 978 - 7 - 5333 - 3104 - 7

I . ①孔… II . ①杨…②宋… III . ①儒家②《孔子
家语》—研究 IV .①B222. 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89792 号

孔子家语通解

杨朝明 宋立林 主编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
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
邮 编 250002

网 址 www.qlss.com.cn

电子邮箱 qilupress@126.com

营销中心 (0531)82098521 82098519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20 mm × 1020 mm 1/16

印 张 40.25

插 页 3

字 数 559 千

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33 - 3104 - 7

定 价 89.00 元

序

李学勤

曲阜师范大学杨朝明教授主编的这部《孔子家语通解》的出版,正好顺应了当前学术界要求深入研究《家语》的趋势。

大家了解,《孔子家语》一书曾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,在其《六艺略》中排次《论语》之后,且有二十七卷之多。然而到唐代,颜师古为《汉书》撰注,提出志文里的《家语》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,于是《家语》的真伪问题成为学术史上一大公案。

颜师古说的“今所有《家语》”,即通行至今的传世本,有曹魏时王肃的注,不过颜氏所说含义有些模糊。汉代的《家语》“非”后来传世的《家语》,究竟是如何“非”法?传世本是不是全伪,与汉代的本子有怎样的关系?并没有交代清楚。

同出于唐世的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有一种比较明确的说法。《礼记·乐记》云: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,以歌《南风》。”郑玄注称“其辞未闻”。王肃作《圣证论》批评郑玄,引用了《尸子》和《家语》的《南风》歌辞。孔疏则引马昭的话,说:“《家语》王肃所增加,非郑所见。”这是认为传世本《家语》有王肃窜入的部分,与宋以下多数学者主张《家语》全伪尚有不同。

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引宋王柏《家语考》,以传世本《家语》系王肃自取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孟》、《荀》、二戴记割裂织成,“反覆考证,其出于肃手无疑。特其流传既久,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,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”。全伪之说于是成为定讞。直到上世纪30年代,世界书局编印《诸子集成》,在其“刊行旨趣”中仍说《家语》“属后人伪撰”,摈弃不录。

当时也还有个别学者持不同意见,例如作《孔子家语疏证》的陈士

珂。陈氏为湖北蕲水人，号琢轩。据其同族陈诗于嘉庆二十三年（公元1818年）给《疏证》写的序，他在乾隆五十八年（公元1793年）因事经过蕲州（今湖北蕲春），陈诗问他关于《家语》的事：“是书也，子朱子于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尝屡引之，而颜监注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则以为‘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’，或者以为王肃增加，近之宗汉学者遂置不道，其果然乎？”陈士珂说：“夫事必两证而后是非明，小颜既未见安国旧本，即安知今本之非是乎？且子观周末汉初诸子，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，损益成文，甚至有问答之词主名各别，如《南华》重言之比，而溢美溢恶时时有之，然其书并行，至于今不废，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？”陈氏《疏证》即以传世本《家语》为主，将其它文献互见的附于各章之后，便于读者比较，对于今天我们探讨《家语》，仍然极为有用。可是陈氏的观点，并不为多数学者接受。

重新考虑有关问题的契机，是近年两批西汉竹简的发现。一批出土于1973年发掘的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墓，墓主推定为西汉晚期的中山怀王刘修，简中一种整理组定名为《儒家者言》（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：《〈儒家者言〉释文》，载《文物》1981年第8期），保存有二十七章。另一批1977年发现在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，墓主是西汉早期汝阴侯夏侯灶，简中一种整理者也称之为《儒家者言》（韩自强：《阜阳汉简〈周易〉研究》，附录一《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一号木牍〈儒家者言〉章题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），这实际是一件目录木牍，上有四十七个章题，不少可与定县八角廊简对照。1987年，我曾有题为《竹简〈家语〉与汉魏孔氏家学》的小文（李学勤：《竹简〈家语〉与汉魏孔氏家学》，载《孔子研究》1987年第2期；又收入《李学勤集》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），以为这两者的性质相类，内容均以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为主，且多和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及传世本《家语》关联，应该都是《家语》的原型。

不少学者在研究新发现的简帛佚籍时，参考传世文献，对比之下，觉察到《家语》特有的优长之处，从而刮目相看，提出有必要重新研究《家语》。然而，和其它若干长期被列为伪书的古籍一样，《家语》缺少精校佳注，不利于进一步工作的进行。

如杨朝明教授所说,《孔子家语通解》这部书是“在坚持学术性第一的原则下,充分考虑现状,对《家语》进行序说、分段、注释、翻译,适应更多的读者,以期有利于推动孔子、早期儒学和中国‘元典’文化的研究”。相信这部书问世以后,更多学者会来集中研究和讨论《家语》,《家语》的内容性质、成书过程、学术价值等等问题,都将逐次得到大家的共识。

2004 年 10 月 29 日

于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

代前言:《孔子家语》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

杨朝明

《孔子家语》是专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。该书汇集了孔子的大量言论,再现了孔子与弟子、时人谈论问题的许多场景,还有经过整理的孔子家世、生平、事迹以及孔子弟子的材料。与《论语》相比,该书内容丰富,具体生动,首尾完备。只是该书长期遭受冷落,被视为“伪书”弃而不用!值得欣慰的是,地下文献的发现与研究,使这部宝贵的典籍终于重见天日。有学者对该书进行了很好地探讨,发现其中的记载极为珍贵,认为该书属于“孟子以前遗物,绝非后人伪造所成”,从而“轰然打破”了原来的“成见”^①。与包括《论语》在内的众多文献相比,该书完全称得上“孔子研究第一书”。但是,对这样一部重要典籍,仍有许多学者存有种种疑虑,许多传统看法仍具有很大影响。为此,本文谨对《孔子家语》的成书与可靠性问题试加梳理研究,不妥之处,敬请教正!

一、《孔子家语》的材料来源与成书

《孔子家语》记录了孔子的言语事迹,可是,这样一部重要著作,为何命运如此多舛?欲弄清此问题,应首先了解该书的材料来源,了解其流传与成书过程。

(一)《孔子家语》的材料来源

今本《孔子家语》附有汉孔安国的序文,根据孔安国序,《家语》为“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。既而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,与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并时。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,别出为《论语》,其余则都集录之,名之曰《孔子家语》”。根据我们的研究,孔安国的说法应该没有问题。

孔子在世之时,长期从事教育活动。那时,在与孔子的交流过程中,弟子都有随时记录和整理孔子言语的习惯,比如,《论语·卫灵公》所记“子张书诸绅”。其实,孔子弟子对孔子的言论都会及时进行记录和整理。《孔子家语》中这样的例子很多,比如:

子张既闻孔子斯言,遂退而记之。(《入官》)

子夏蹶然而起,负墙而立,曰:“弟子敢不志之!”(《论礼》)

冉有跪然免席,曰:“言则美矣!求未之闻。”退而记之。(《五刑解》)

子贡以告孔子,子曰:“小子识之:苛政猛于暴虎。”(《正论解》)

孔子闻之,曰:“弟子志之:季氏之妇,可谓不过矣。”(《正论解》)一方面,孔子弟子将孔子的嘉语善言主动加以记录;另一方面,孔子遇到一些重要问题,也常提醒弟子注意、记住。

在上引材料中,“志”、“识”都有“记”之意。如《礼记·礼运》记孔子曰:“大道之行也,与三代之英,丘未之逮也,而有志焉。”其中的“志”,在《孔子家语》的《礼运》篇中作“记”。《礼运》篇中,不论“记”还是“志”,都有“记载”、“记录”、“志书”之义,朱彬《礼记训纂》即引刘台拱解此字曰:“识也,识记之书。”

在孔子弟子记录老师言行这一方面,尤其值得注意的是《孔子家语·七十二弟子解》中的有关记载:

叔仲会,鲁人,字子期,少孔子五十岁。与孔璇年相比。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,二人迭侍左右。孟武伯见孔子而问曰:“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学,岂能识于壮哉?”孔子曰:“然!少成则若性也,习惯若自然也。”

这说明当时有专人负责记载孔子言行。可见记载夫子事迹的《论语》、《家语》等书应该是孔门弟子的实录。

在与孔子的交流中,弟子们学到了很多東西,可以想见,不少弟子都有自己整理保存的有关记录。那么,这些材料是什么时候汇聚起来的,又是怎样汇聚起来的?

关于《论语》的成书时代,学界有过许多较好的研究,综合学界的研究,结合新出土材料进行探讨,《论语》应该是孔子裔孙子思最终主持编纂而成^②。在此基础上,我们进而推断《家语》的编纂,也一定与子思有重要的联系。有一细节值得注意,即孔子去世后,孔子的众弟子似乎难以承受失去老师所带来的迷茫,他们曾经因为同门有若“似孔子”,而推举他代替老师。但好像没多久,有若因为毕竟不是老师,不能完满地回答同门的提问而遭到否定。这也透露了孔子弟子在孔子去世后的分化,大约与此同时,编纂孔子遗言的提议也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。据分析,在此及稍后的一段时期内,最有资格、有能力,又有号召力的孔门后学就是曾子与孔子裔孙子思,《孔子家语》最终成于子思的领纂当无问题。^③

这里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,就是《孔子家语》为何被称为“家语”,该书的最初形态如何?有人以为《家语》的名称是后来才有的,我们认为未必如此。

《家语》孔安国序谈到了荀子入秦所带书籍,其中没有“孔子家语”的名字,而称为“孔子之语及诸国事、七十二弟子之言”;再说到秦始皇焚书时,才又冠以“孔子家语”之名。于是有人认为本来没有“孔子家语”之名。后来,该书曾经流散,几经周折,孔序说是“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妄相错杂”,直到最后,孔安国重新得到,分门别类,撰集成四十四篇的《家语》。在后孔安国序中,也没有说先秦已有《家语》;子襄壁藏诸书有《家语》,清人孙志祖引徐鯤说指出:“此‘家语’二字后人妄加也。”今也有人认为,孔衍奏言两次讲到孔安国“集录孔氏家语”、“又撰孔子家语”,可见孔衍也认为《家语》是由孔安国编成的,“家语”的名字可能与他有关。

其实,这样的推断是难以讲通的。荀子入秦所带书籍不止一种,没有提及《孔子家语》的书名非常正常,这与战国时期《家语》已经成书的说法并不抵触。《家语·孔序》和孔衍奏言都说孔安国和《家语》有密切关系,这当然没有问题。但如果说孔安国之前并没有《家语》一书,看来难以成立。孔安国所编撰的《家语》在汉代一直没有流行,但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家语》列为《论语》十二家之一,这说明《孔子家语》的名字应该早已有之。

其实《孔子家语》的名字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已经透漏了端倪。按照司马迁的描述,孔子去世后,“孔子家”成为诸生演习讲礼的场所,成为弟子后学缅怀、追思恩师的场所。其中记载说:

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,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。孔子冢大一顷,故所居堂、弟子内,后世因庙……

有学者指出,其中的“冢”应为“家”之误,这里的三处“孔子冢”都应当作“孔子家”^④。这与后面所说的“诸生以时习礼其家”正相对应,因为乡饮、大射之礼也不能在“冢”上举行。

弟子后学住进孔子原来的居堂中,除了按时举行礼仪,他们还将各自整理保存的孔子的“讲课记录”汇聚到一起。我们可以想象,随着孔子的逝世,弟子后学失去了恩师,也失去了自己精神的寄托,因此,他们便聚汇孔子言论,集中孔子学说,最终在孔子裔孙子思的主持下,共同编辑了《孔子家语》。

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语,论也。”《广雅》说:“语,言也。”“孔子家语”应该就是“孔子家”的论说集或言论集,也是在“孔子家”中编辑而成的论说集、言论集,不难理解,《孔子家语》与《论语》在内容性质上完全相同。

(二)《孔子家语》的早期流传

孔子弟子将各自记录整理的有关孔子的材料汇聚“集录”在一起,这应当就是《孔子家语》的原型。很明显,在以后的日子里,这个较为完全的“集录”本会有不少儒家弟子后学进行传抄,从而流行开来。

在《家语》的孔序中,孔安国较为清楚地描述了《家语》的流传情况,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如下:

第一,战国之世,孟子、荀卿守习儒学,《孔子家语》可能传本不一。“孔子既没而微言绝,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,六国之世,儒道分散,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,唯孟轲、孙卿守其所习。”

第二,荀卿入秦,以“孔子之语及诸国事、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”献秦昭王,《家语》由此传入秦国;又由于种种原因,后来始皇焚书时得以幸免。在孔安国看来,先秦虽有少数《家语》材料在流传,也一定会有不

少人在传习《家语》，但荀卿毕竟“守其所习”，而且，将《家语》传到秦国并且使之流传到汉朝，都是荀卿的功劳。这样，就保证了《家语》材料的“纯正”，避免了“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”的影响。

第三，汉初刘邦灭秦后，“悉敛得之，皆载于二尺竹简，多有古文字”，后为吕后取而藏之。吕氏被诛亡以后，《家语》散入民间，遂出现了《家语》的多种本子。后序曰：“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，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。”

孔安国所言“悉敛得之”，说明汉灭秦时所得到的《孔子家语》是一全本。他还说这些材料“皆载于二尺竹简，多有古文字”，这些描述，非亲见者难以言之。孔安国见到这些竹简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从汉朝得到这些材料，到吕后得到这批材料，再到他本人那个时期，这些材料一直是在流传着的。

第四，景帝末年募求天下书，那时，京师士大夫皆送官，得吕氏所传《家语》，不过，这些材料“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妄相错杂”，“与《曲礼》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”。

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十分重要。景帝末年募求图书时，官府中一定集中了不少《孔子家语》的材料，也就是说，在景帝时，秘府已经有了《孔子家语》一书。当然，这部《家语》（或这些《家语》材料）还存在着不少问题，因为这些可能已经不单纯是《家语》的竹简，而是与其它相关记载“妄相错杂”。

（三）孔安国写定《孔子家语》

在西汉秘府中，《孔子家语》虽有收藏，但因为与其它材料混乱地放在一起，仅由“掌书”负责掌管而已，因此，一定会严重影响到该书的利用。正因如此，后来才出现了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官家图书中的《孔子家语》后来没有流传下来；第二，孔安国想方设法重新整理了《孔子家语》。

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西汉秘府中的《孔子家语》有二十七卷，虽然这些材料可能后来还曾经有人使用，但因为该书存在一定的问题，所以当孔安国的孙子孔衍奏请将安国整理后的《家语》立于学官时，刘向本人也是

同意的。再到后来,曾经收藏在秘府中的这个《家语》还可能被整理传抄过,不过,最终可能还是不及孔安国整理的本子而归于亡佚。

汉武帝元封年间(前110—前105年),孔安国在京师为官。作为孔子后裔,他了解到《孔子家语》在秘府中的状况,很担心“先人之典辞将遂泯没”,于是,他设法得到这些材料,抄录整理,“撰集”而成为四十四篇的《孔子家语》。这部著作流传至今,这便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《家语》本子。

孔安国叙述自己“撰集”《家语》的经过说:

因诸公卿大夫,私以人事,募求其副,悉得之,乃以事类相次,撰集为四十四篇。又有《曾子问礼》一篇,自别属《曾子问》,故不复录。其诸弟子书所称引孔子之言者,本不存乎《家语》,亦以其已自有所传也,是以皆不取也,将来君子不可不鉴。

孔安国通过私人关系取得了《家语》的材料,进行整理。他搜求材料,明确说是“悉得之”,看来,这些《家语》材料应该还是比较完备的。在此基础上,他按照事情的类别进行编次,分为四十四篇。从今本《家语》看,各篇之间既有内在逻辑联系,也有重新编次的痕迹。

比如,本书以《相鲁》为第一篇,从孔子仕鲁开始;接着是《始诛》,记孔子为大司寇时事;第三篇《王言》乃孔子与曾子的对话,这不仅仅是因为子思为曾子弟子,就像《论语》中曾子的地位显得非常特殊一样,《孔子家语》因为子思师事曾子,而格外重视曾子的言论,更重要的是,孔子倡言王道,该篇所谓“王言”,乃是记述孔子的“王”天下之言。在前三篇之后,第一卷中的各篇都是孔子回答诸侯国国君,主要是鲁哀公的谈话;然后,各篇才记述孔子与弟子们的论说。后面依照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区分,如在第八卷中,将冠礼、庙制、音乐等归在一起,显然有一定考虑。在基本排列完有关材料后,第九卷将孔子弟子、孔子家世、孔子临终情况分别单篇叙述,又将孔子的一些零散言论作为“正论”列为一卷。最后一卷三篇都是孔子与弟子关于曲礼的问答。这种逻辑联系或许可以由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一条记载得到某种程度的证明。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所收

清人姜兆锡的十卷本《家语正义》:

是书首列至圣年表正讹,其四十四篇之次,则从葛鼎本。以《正论》与三《问礼》篇为卷九,以《本姓》、《终记》与《七十二弟子》篇为卷十。

这种始于《相鲁》迄于《终记解》、《七十二弟子解》的篇目次第与今本不同,因而该版本的《家语》显得更像是以从政为主题的孔子传,因而更具体系性,但今本次第却说明《正论》及《曲礼》三篇或许应是《家语》附录。^⑤

孔安国对原来的材料进行编次时,毕竟有些不好归属,所以在今本《家语》中不难看到本应不属同篇的材料被归到了一起。他的重新编次,当然已经与最初时期的次序不同。但是,不论其编次如何,他都是尽力使这些材料的顺序符合一定逻辑。毫无疑问,孔安国的编次是对《家语》的再加工过程,但可以肯定的是,他一定会尽力保存《家语》材料之真,也就是说,尽管他进行了重新编次的工作,该书材料的真实性却并不受到影响。

还有一点,孔安国说到吕氏被诛亡后,《孔子家语》散在民间,从而使《家语》出现了“同是一事而辄异辞”的现象,这显然是“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”所造成的。这应当是孔安国在整理编次《家语》时发现的问题。我们推测,他就一定会在“录副”时有所考虑,有所去取抉择。很显然,孔安国不仅为我们保留了孔子与早期儒学研究的宝贵材料,而且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梳理,他对于《孔子家语》的整理功不可没!

二、《孔子家语》的家传、注解与“伪书”问题

谈《孔子家语》,不能不谈该书的真伪之争。长期以来,《家语》被视为“伪书”的典型代表,严重影响了该书的研究和利用。

《家语》“伪书”说的形成,与其成书与流传问题紧密相联。今本《家语》经孔安国写定后,经历了一个家传的过程,后来,三国时期的王肃得到

该书,并为此书作注,使该书开始流行。然而,由于今本《家语》之外可能还有原来官府的所谓《家语》本子存在,而且,经过孔安国的整理,舍弃了其中有关的一些材料,比如他曾经提到的“《曾子问礼》一篇”、“诸弟子家所称引孔子之言”等等,这些材料被人作为《家语》进行使用,从而影响到后代学者对今本《家语》的认识。于是,后来有人认为《家语》存在严重问题,再到后来,《家语》居然成了“伪书”,人们不是以为孔安国“作伪”,就是认为王肃“作伪”。清代以后,由于疑古思潮的严重影响,《孔子家语》作为“赝品”,在有的学者心目中已经简直不值一提,而以《家语》为真,认为应当认真对待该书的声音,几乎完全被疑古大潮所淹没。

(一)《孔子家语》的孔氏家传

在汉武帝时期,孔安国虽然为官于朝,按照乃孙孔衍所说,他也是“以经学为名,以儒雅为官,赞明道义,见称前朝”,但是,他写定《孔子家语》,主观目的却在于保存“先人之典”,带有“私”的性质,所以,尽管他在编次《家语》上下了很大功夫,但从其写定,直到三国王肃之时,在三四百年的时间里,《家语》却是一直作为家传图书而存在。

汉代,今本《家语》仅仅作家传本流传,一个最重要证据便是其不像被编入《礼记》、《大戴礼记》等书中的材料那样,动辄就避汉讳,不像大小戴《礼记》那样带有明显的汉人编辑的痕迹。

在《四库全书》中,《孔子家语》本属于御题影宋钞本,乃毛晋汲古阁收藏的本子。在该版本的后面,不仅有孔安国《孔子家语》的后序,而且有孔安国后人所撰后序,这两篇序文将孔安国以后《家语》在汉代的家传情况介绍得比较详细。

需要辨明的是,不少学者误解孔安国后人所撰后序,认为其中的记载自相矛盾,由此怀疑该文的可靠性。人们的误解主要是关于《孔子家语》是否出于孔壁,有关情况序文中是这样说的:

子襄以好经书,博学,畏秦法峻急,乃壁藏其家语《孝经》、《尚书》及《论语》于夫子之旧堂壁中。……天汉后,鲁恭王坏夫子故宅,得壁中《诗》《书》,悉以归子国。子国乃考论古今文字,撰众师之义,

为《古文论语训》十一篇、《孝经传》二篇、《尚书传》五十八篇,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。又集录《孔氏家语》为四十四篇……

序文在下面引述孔衍奏言的时候又说:

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,得古文科斗《尚书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,世人莫有能言者,安国为之今文,读而训传其义。又撰次《孔子家语》。人们看到序文中“乃壁藏其家语《孝经》、《尚书》及《论语》于夫子之旧堂壁中”,以为“家语”就是《孔子家语》,其实,此处所言的“家语”乃是“孔子家的言语论说书籍”的一个泛称,包括被壁藏的“《孝经》、《尚书》及《论语》”之类的所有材料。序文中并没说子襄壁藏的书籍中有《孔子家语》。这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汉书·鲁恭王传》等材料中的相关记载完全一致。

孔安国曾经整理孔壁藏书,但在两篇序文中,都同样没有说他整理的书籍包括《孔子家语》。孔安国序文明确叙述《家语》的流传过程,丝毫没有说它与孔壁有什么联系,在孔安国后人的序文中,也同样都是将孔安国整理孔壁藏书与“集录”或“撰次”《家语》分开来说的。

孔安国后人的序文到底出于何人之手,由于材料缺乏,已经很难知晓,但其中所叙述的有关情况是值得充分重视的。该序首叙从孔子到安国十二世的孔氏世系,又全文引述安国之孙孔衍给汉成帝的上书。无论是序文的介绍还是孔衍的上书,都称孔安国整理《孔子家语》以后,该书并没有献出来呈交朝廷。

据介绍,孔安国整理《家语》后,由于遇到巫蛊事件,未来得及呈献。不久,安国被调离京师,后来去世,此事就被搁置下来,这便是安国后人序文中所说的“寝不施行”。后来,汉成帝诏刘向校定众书,忽视了孔安国校订的各书,遂使这些书籍仍然“各废不行于时”,其中自然包括《孔子家语》,所以,孔衍希望朝廷能够将这些重要的典籍材料“记录别见”,他上书汉成帝说:

光禄大夫向以其为时所未施之,故《尚书》则不记于《别录》,《论语》则不使名家也。臣窃惜之。且百家章句,无不毕记,况孔子家古

文正实而疑之哉！又戴圣近世小儒，以《曲礼》不足，而乃取《孔子家语》杂乱者，及子思、孟轲、孙卿之书以裨益之，总名曰《礼记》。今尚见其已在《礼记》者，则便除《家语》之本篇，是为灭其原而存其末也，不亦难乎？臣之愚，以为宜如此为例，皆记录别见，故敢冒昧以闻。

孔衍认为孔安国所抄录的《家语》，本来“皆载于二尺竹简，多有古文字”，虽然“为时所未施之”，但戴德、戴圣在自己编辑的《大戴礼记》、《礼记》中，却收录了《家语》的材料，于是，人们反而不知道《家语》而仅仅知道他们编辑的书籍了。其实孔衍奏言的“今尚见其已在《礼记》者”一句，在明代学者梅鼎祚的《西汉文纪》中作“今向见其已在《礼记》者”，“向”即刘向，这就是说，刘向在校对秘府所藏《家语》材料时，因为其中有“已在《礼记》者”，于是便“灭其原而存其末”，因此，孔衍才在奏言中对刘向的做法表示不满，从“奏上，天子许之”的态度看来，孔衍所奏并非虚言。^⑥

可惜的是，孔衍奏言虽得到了成帝的允许，但还没有来得及最终研究确定，成帝就一命呜呼。与之同时，掌管校书的刘向也因病去世，其最终结果还是“遂不果立”。

认真品味两篇序文，综观整个过程，不难看出，无论孔安国还是孔衍，他们都是希望《家语》能够立于学官，流行于世，但是，由于非常巧合的种种变故，《家语》在汉代始终都是以家学的形式流传。安国之后，《孔子家语》传到了其孙孔衍，孔衍希望朝廷“记录别见”未成，《家语》自然继续家传。孔衍之后，有人作了包括了孔衍“奏言”的《孔子家语》后序，此人显然也是《家语》的传承之人。那么，这篇序文出于何人？在序文中，作者直接引述了孔衍“奏言”，而孔衍只提到刘向，其中也并没有补述刘歆等人如何看待《家语》。根据序文的语气、表述，不难推测此人距离孔衍不远，他即使不是孔衍的同一辈人，也是他的不远的后辈。

直到三国时，《家语》家传的历史才由于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将之献给王肃而结束。《家语》的王肃序说：“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，家有其先人之书。昔相从学，顷还家，方取以来。”按照这个说法，在王肃注解《家语》之前，孔氏家藏的这本《孔子家语》一直没有能够流行于世。幸好

孔猛为王肃弟子,而书中所言与王肃所论“有若重规迭矩”,《孔子家语》才在王肃整理之后流行起来,这都证明此前孔安国所整理的本子仅仅具有孔氏家传本的形式。

(二)王肃注解《孔子家语》

今本《家语》在孔安国写定后,经过两汉时期的家传过程,终于在三国魏王肃之时公布于世。作为经学家,王肃的观点有一些与当时流行的郑玄之学不同。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从师于肃,他将家传的《孔子家语》拿给王肃看,而王肃看到这些材料与自己的学说暗合,且可以作为驳正郑学的根据,他不希望这些材料复归于无闻,于是为该书作注,使之行世。王肃为《家语》作注,是《孔子家语》正式研究的开端,王注也就成为《家语》的第一个注本,他为今本(孔安国本)《家语》的流行作出了特殊贡献。

王肃反对郑学,绝非故意标新立异。但在王肃时代,世人已经对他多有误解,对此,王肃说:“自肃成童,始志于学,而学郑氏学矣。然寻文责实,考其上下,义理不安,违错者多,是以夺而易之。然世未明其款情,而谓其苟驳前师,以见异于人。”事实上,到三国之时,郑学已经显露出了弊端,尤其是其烦琐与神秘性的弊病,已经与时代不合,因此,“魏晋之际,清谈前期反郑之说蔚起,蒋济尝难郑玄注《祭法》,王粲有难郑玄《尚书》事,虞翻奏郑玄解《尚书》违失”^⑦,在这些反对郑玄的学者中,王肃不过是比较有影响的罢了。

学术总是在不断发展前进。当年,郑玄会通古今,遍注群经,对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,从而奠定了他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到王肃时期,郑学已经风行五十多年,其缺失陆续呈现,在此背景下,王肃起而纠正郑玄之失。王肃说:“予岂好难哉?予不得已也。圣人之门,方壅不通,孔氏之路,枳棘充焉,岂得不开而辟之哉?”王肃与郑玄在学术上的分歧焦点,《晋书·礼仪志》中有明确记载:“三年之丧,郑云二十七月,王云二十五月;改葬之服,郑云服缞三月,王云葬讫而除;继母出嫁,郑云皆服,王云从乎继寄育乃为之服;无服之殇,郑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,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。如此者甚众。”当然,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止此。